

261423

〔清〕

吴敬梓
黄小田
评点著

儒林外史

李汉秋
黄山书社
辑校

I207.41
60

261423

儒林外史

〔清〕

吴敬梓
黄小田
评点著

李汉秋
黄山书社
辑校

责任编辑：项纯文

装帧设计：方绍武

儒 林 外 史

黄小田评本

〔清〕吴敬梓著 李汉秋辑校

黄 山 书 社 出 版

（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）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6.75 插页：2 字数：440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2,000

统一书号：10379·34 定价3.50元(平)

4.70元(精)

前 言

小说评点能在读者阅读原作时随处加以品评，把文艺批评和鉴赏指导渗透到阅读过程中去，所以历来受人欢迎，成为我国明清小说出版的传统。今存最早的卧闲草堂本《儒林外史》就是有评点的，其评语简称“卧评”，在清代被视为这部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沿印、评鹭。其后齐省堂本增加了新评点，简称“齐评”。再后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采天目山樵(张文虎)的评语(简称“天评”)作夹批。以上三种版本一般人都不易见到了。现在我们整理的这部黄小田评点本，是第四部印行的《儒林外史》评点本。

黄小田评点《儒林外史》其实还在齐评和天评之前。

黄小田名富民，字小田，自号萍叟，乾隆六十年(1795)生，同治六年(1867)卒。原籍安徽当涂，先世八代居住芜湖。其父黄钺(1750—1841)字左田，嘉庆时官至礼部尚书，嘉庆、道光两朝在内廷供职二十七年，工书善画，颇有名气，与大学士董诰并称董黄二家。道光六年(1826)告归芜湖，直至九十二岁逝世。小田是其季子，道光五年(1825)拔贡，官礼部侍郎，因父病请省亲回芜湖，父死后不复出山。咸丰三年(1853)太平军攻克芜湖，他被亲家钱鼎卿接去南汇住五载，后移居松江、苏州、上海一带，游踪达于嘉兴、杭州等江浙名城，但总念念不忘芜湖故乡，不忘留在芜湖的房屋和数万卷藏书。同治六年(1867)逝于沪上，终年七十三岁。他善诗，其子黄安谨编他的诗词为《礼部遗集》行于世。他喜欢小说，说：“予最服膺者三书：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石头记》也。”

后二书他都细加评点，《红楼梦》评点现存南京博物院。

他评点《儒林外史》当在1853年离开芜湖浮居江苏后的十年间，这正是太平天国统辖南京、杭州、芜湖一带的时候，评语中留下了时代的印迹。小说第二十四回描绘南京的繁华景象，他批曰：

“此雍、乾之南京，嘉庆时便不能如此，休论如今。”在第十四回马二游西湖处批曰：“此是雍、乾间西湖，而今已矣。”第二十八回在季苇萧说扬州盐商戴方巾加“水晶结子”处批曰：“其实是水精顶帽，托之明代，故曰结子。然此系八、九十年以前事，后来无不蓝顶矣。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十三回，小说描绘芜湖江面落照，他批曰：“是芜湖江口景致，令我乡思之勃然。然以今思之，又惨然矣。”“乡思”可证评者世居芜湖。为什么“惨然”呢？这需要深究。按太平军以1853年2月攻克芜湖，直至1862年5月，黄小田就是因此避往江苏的，这段时间他的诗作经常流露乡思“惨然”的情绪，估计“惨然”的评语也当作于其间。

再从他与张文虎的交往来看，他一到南汇就结识了张文虎，两人过从甚密，酬唱之作很多，在一首《访啸山(文虎)留宿因赠》中说：“悔于世事言多激，剩有诗篇老尚贫。谁道天涯少知己，三年博得性情谙。”引张文虎为知己，并道出了他们“于世事言多激”的共同思想情绪。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，清王朝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，黄小田、张文虎辈也不能不有激烈的怨怼之词，也许这也是他们共同喜欢《儒林外史》的重要原因吧。后来张文虎回忆说“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《外史》”并谈论其作者，估计就在此时。到1863年张文虎离开南汇赴皖，分别三年，当1866年张文虎过沪见到黄小田时，黄的精力已不济，翌年就病逝。黄小田与张文虎过从密切有机会谈论《儒林外史》并出示其评点者，当在1863年远别之前。

黄小田死后，同治九年(1870)黄安谨为他编《礼部遗集》，请张文虎校订并作序。关于他的《儒林外史》评点，黄安谨在《〈儒

林外史评》序》中说：“先君在日，尝有评本，极为详备，以卷帙多，未刊。……天目山樵亦有旧评本……因合梓之。”但无论是在1885—1886年出版的这本《儒林外史评》中，还是1881年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《儒林外史》中，标明“萍叟云”——黄小田评的，统共只有三条，这与“卷帙多”而且“极为详备”者相去甚远，黄评的全貌早已湮没不见。

谁知这部久湮的黄评竟能冲破一个多世纪的尘埃重现于今日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！

我们发现的这部黄评过录在同治八年(1869)苏州群玉斋活字本《儒林外史》上，以墨笔作眉批，另用红笔过录1881年版的天评。墨抄的黄评由三部分组成：批于卷首“闲斋老人序”（简称“闲序”）后和总回目后的两则题识较长，明署“当涂黄富民序”和“小田氏又识”。第九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三、二十六、三十二、三十八、四十三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四、五十五等回末有总评，都署明“黄评”，自是黄小田评的简称。各回总计有二千余条眉批，按惯例不一一署名，其观点、用语、笔迹都与题识、总评一致；两种版本的天评中标明“萍叟云”的三条都在其中，并没有任何特别标志，也可旁证此类墨批同是黄评。

全书十二册，分别以虞集词“报道先生归也，杏花春雨江南”十二字相标，封面题“癸亥仲秋，君彦重装”。君彦是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徐世章的字，他是天津人，书法绘画都有专长，1941年逝世，这是他于1923年重装的。

我们整理时利用今存最早的《儒林外史》版本卧闲草堂本以及苏州潘氏清抄本，申报馆第一、二次排印本等，对苏州群玉斋本的小说原文进行了认真的校勘。把原来以眉批出现的黄评一律改作夹批，列于相应的正文之下，以另一种字体与正文相区别。黄评不仅评点小说原文，而且在卷首闲序后有题识，对卧评也加以评鹭，因此我们也把闲序和卧评刊出，给读者以黄评的全貌。

天目山樵评点《儒林外史》在黄小田之后。当时在南汇和上海，形成了一个以天目山樵为中心的《儒林外史》沙龙，他的评点未刊前就在沙龙中传阅，他自己说先后借给雷谔卿、闵颐生、沈锐卿、朱贡三、杨古酝、艾补园过录，这些人又辗转传给其他人过录或阅览。其中上海诸生徐允临(号石史)最热心，是《儒林外史》和天评的积极收辑者、校订者和传播者。他曾两次过录天评于从好斋辑校本中，第一次在光绪五年(1879)，听杨古酝提起后急从艾补园处借来过录，第二次在光绪十年(1884)，直接向天目山樵借来“评语定本”重新过录，过录后他又借给王承基、华约渔等阅读。天评的第一个印本——1881年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，可能就是由他和艾补园向申报馆提供的；光绪十二年(1886)他又将上海宝文阁1885年刊行的《儒林外史新评》加以校阅后重新刊行为《儒林外史评》，这就是天评的第二个印本。后来与这个沙龙有联系的还有金和之子金是珠、黄小田之子黄安谨等。天评的两种版本印行后又多次重版，而且很快就象卧评一样成为清末《儒林外史》研究者评鹭的对象，平步青《霞外摭屑》里有关《儒林外史》的文字，主要就是针对天评而发的，天评成为卧评之后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《儒林外史》评点。

但至今无人知道这个天评是深受黄评启发、影响和沾溉的，天评里其实流动着不少黄评的血液。

天目山樵评点《儒林外史》应当说是在黄小田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，黄小田实际上是这个“《儒林外史》沙龙”的先驱，他不仅与天目山樵交契甚深，而且同这个沙龙里的杨古酝等也有直接交往，在《礼部遗集》里还可以看到他的《寄杨古酝》等诗作。

天目山樵评点《儒林外史》历时一二十年，有一个不断评点的过程。现在见到的最早识语写于同治十二年(1873)，见于同治十三

年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《儒林外史》卷末。光绪三年(1877)他写的识语说“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”，以后还不断地“随时增减”，直至1886年《儒林外史评》校订本印行，他在该书的题跋中说：

“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《外史》……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，而似有未尽，因别有所增减，适工人有议重刊者，即以付之，三年矣，竟不果。去年黄子脊(安谨)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，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，仍未妥洽，因重为批阅，间附农部旧评，所标萍叟者是也。”从这段话看，他评点《儒林外史》经历了两个阶段：前一阶段是觉得黄小田的评语“似有未尽，因别有所增减”，既是在黄评的基础上进行“增减”，估计保留黄评必多，但谋付印而不果；后一阶段是他自己“重为批阅”，只是“间附农部旧评”，换言之，是以自己的评点为主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评。

拿天评同黄评一对照就可以发现，天评中溶化了许多黄评。

有少数直接沿袭黄评的文字，例如第一回，黄评：“秦老难得。”同处天评：“秦老却难得。”第十二回，娄家两公子看家书知道魏厅官来府是为丈量的事，黄评：“即将丈量事，销纳家书中，省笔墨也。”天评：“即将丈量事，消纳家书中，以省叙述。”

有许多基本沿用黄评，只是文字稍作加工。例如，第二回王举人初见周蒙师(进)，黄评：“无人可谈，不得不屈尊俯就，然非其所愿，故曰‘你这位先生’。轻之甚。”天评：“无人相陪，屈尊俯就，故曰‘你这位先生’。”第四回范进吃大虾元子，黄评：“善谑，未免有伤忠厚。此等处，实先生所深恶。”天评：“谑而虐矣，盖作者甚恶此辈。”此类情况很多。经修改后，天评文字一般比黄评更准确洗炼。

有许多在黄评的基础上内容又有所补充，例如，第十五回匡超人要与马二结为兄弟，黄评：“马二先生不止年长一倍，公然欲拜为兄，其心本不厚。”天评更详：“匡超人此时只二十二岁，马二先生补廪已二十四年，年长当已倍之，况此番恩德，自当拜以为

师，何徒曰‘盟兄’而已？他日为人不终，即基于此。难在马二先生毫无德色，不以为意。”第三十七回祭泰伯时推马二为三献，黄评：“论三献原应迟、杜二位，特以之做引赞，故推马二先生，以文字不可板故耳。”天评补充说：“迟、杜是倡此举之人，无自为三献之理，故特推马二先生，要非虞、庄匹也。序法平中带侧，读者自见。然细思此时除马二先生外更无足当三献者。”

有的单从字面上已看不出与黄评的关系，但两相比较仍可看出天评是从黄评蜕衍而出的。例如，第三回周进问应考的范进“如何总不进修？”黄评：“当先自问。”天评：“公何以总不进修？”第十二回权勿用侈谈“五荤”，黄评：“不言酒，却拉上五荤为戒酒之证，想是从程朱考核得来。”天评：“此是程朱学问了。”在内容上有很明显蝉蜕的痕迹。天评的不同版本还在继续蝉蜕的过程，例如，第四十六回余大先生挖苦成老爹的酒糟脸，黄评：“余大先生不说轻薄话的，可见厌极了。”1881年版天评：“余大先生亦能说刻薄话。”到1886年版天评则改为“余大先生亦能发科”。第五十三回度婆接待陈木南，黄评：“事事带定国公府。”1881年版天评：“带定国公府。”1886年版天评则改为“不离国公府”。其趋势是：从黄评脱胎衍化而离黄评文字愈来愈远。

天评也时常针对黄评而发表不同的见解，例如，第三回范进中举邻居帮忙，黄评：“忙杀邻居，干卿何事耶？”天评：“或云‘忙杀邻居，干卿何事’，予谓不然，邻居做官大家喜欢，人情之常。高世远俗之见不可责之齐民，若皆落落自顾，虽圣人不能为治。”第十三回娄公子准备“人头会”，黄评：“人头会却新，猪头会则俗矣。”1881年版天评：“‘人头会’三字亦不雅。”一个“亦”字保留了它原针对黄评而发的痕迹，到1886年版的天评只作“三字不雅”，已经看不出蜕衍的痕迹了。对黄评提异议，却正是从黄评蜕变出来的一种方式，如果不知有黄评，也就不知道天评何以出此。

对《儒林外史》的总体看法，天目山樵也深受黄小田的影响。

例如，黄评说功名富贵为“一篇主意”，天评也同意“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”的说法。黄评看重小说“描摹假名士、假高人以及浇风恶俗”而不重视反科举，天评也说“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”。黄评强调吴敬梓“嫉世救世之苦衷。夫不解读《儒林外史》是亦《儒林外史》中人矣。”天评也说“勿负著书者一肚皮眼泪”，“有不欲读者——不以《外史》中下材为非者也。”黄评认为《外史》“篇法仿《水浒传》”，而“事则家常习见，语则应对常谈，口吻须眉惟肖惟妙。”——比《水浒》更加贴近日常生活。天评也说“《外史》用笔实不离《水浒》”，“然描写世事，实情实理，不必确指其人，而遗貌取神，皆酬接中所频见，可以镜人，可以自镜。”正由于在总体看法上很相近，所以许多具体评点可以相沿袭。统计起来，天评约有十几分之一是从黄评衍化出来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《儒林外史评》是天目山樵、黄小田“合评”，也未尝没有道理，因为黄评有许多已为天评所消化吸收化为天评的血液了。

过去因黄评久湮，人们只知道天评影响大，不知道没有黄评就没有天评。现在是到了恢复黄评在《儒林外史》评点史上地位的时候了。

三

黄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自身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。兹略举数端藉窥全豹。

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主旨，闲序和卧评都强调“功名富贵”，闲序说它是“一篇之骨”，卧评说它是“大主脑”、“第一着眼处”。黄评则说它是“一篇主意”（第一回），并且不断加以发挥。在评周进撞号板痛哭吐血时说：“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，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。”（第三回）。评祭泰伯说：“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，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。”（第三十三回）。可见黄评认为吴敬梓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中心来描写人物的。

针对唯“功名富贵”是求的浇薄士风，吴敬梓提倡讲究“文行出处”。王冕、杜少卿都是看重文行出处而淡泊功名富贵的理想人物。黄评领会此旨。王冕批评八股取士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”黄评：“作书本旨。”（第一回）杜少卿道：“这征辟的事，小弟已是辞了。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，徒惹高人一笑，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。”黄评：“此是作书本旨。”（第三十三回）。

一切以功名富贵为中心，就出现了象盖宽说的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”的世风，用闲序的话说就是“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，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”。黄评则用两个字概括，就叫“势利”。第二回评曰：“盖是书所写不出‘势利’二字”，申祥甫、夏总甲“虽极可笑，然一部书用意早具于此。”第七回评薛家集人因周进做了官而改变对他的态度说：“写乡村人情总不脱‘势利’二字。”第八回说王惠“开口无非势利”。第十六回说“匡二（匡超人）本质似美矣，而一入势利场，遂全失本来面目，……然则功名富贵非贼人之物哉！作者深有慨乎。”黄评对“功名富贵”与“势利”的体认也是颇得吴敬梓本意的，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六回不是叫作“三山门贤人饯别，五河县势利薰心”么，贤人是看重文行出处的，而五河县的世风正是用“势利薰心”来概括。

对这样的世风，吴敬梓是深恶痛绝的，黄评对此深有领会，一再强调吴敬梓“嫉世之深”。这种嫉世之心，一方面不能痛快淋漓地直接发泄，而是郁结于心，结果郁结愈久，痛苦愈深；另一方面不是痛快淋漓地正面表现，而是纡曲表现，结果纡曲愈甚，愈显沉痛。黄小田评夏总甲时说得好：“开卷便有如此妙笔，盖先生冷眼蓄之既久，又不肯明目张胆骂人，特从此辈发科，嫉世之心，乃愈形其沉痛。”

正是从这里深挖下去，把捉到了吴敬梓讽刺的独特风格。一方面，嫉世深，但不直接破口大骂，而是把愤恨之情浓缩在对人物言

谈举止的客观描写之中，把人物的丑恶言行描绘得淋漓尽致，揭露得入木三分，形似不骂而实则骂杀。黄评对此深有体会，当范进一边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，以示遵制丁忧，一边却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时（第四回）；当王仁为一封银子而不顾病危的妹妹，却大言不惭地拍着桌子说：“我们念书的人，全在纲常上做功夫”时（第五回）；当高翰林高谈“龙虎榜”，说杜少卿“果然肚里通，就该中了去”时（第三十一回）；当方盐商大闹节孝祠，权卖婆捉虱尊经阁时（第四十七回）；黄小田分别批曰：“善谑，……此等处实先生所深恶。”“骂杀骂杀！……作者之笔厉害如此。”“骂杀，……正是嫉世之深。”“写到如此不堪，令阅者几不欲观，而先生不遗余力，穷形尽相，岂非禹鼎铸奸，欲少有天良者一醒悟耶！”他都从对人物言行的客观描绘里，感知到吴敬梓深恶痛绝的切齿之声。同时又进一步指出，吴敬梓的目的不是“骂世”，而是为了“醒世”、“救世”，他一再申论，“可见是醒世之书，非骂世也”，要人“细读而深味之，庶不负先生一片醒世婆心”、“救世苦心”。

另一方面，嫉世太深，炽热的憎恶经过凝冻，化为冷嘲，“不以庄语责之，而以虐语诛之”（卧评）或出以戏谑语，或出以讥诮语，似褒实贬，嘻笑里露出讽刺利刃的寒光。黄评对此颇为敏感，小说第十三回末预示匡超人出场说“僻壤穷乡，出了一尊名士”，黄评：“名士而曰‘一尊’，善戏谑兮。”小说第五回写王德、王仁出卖了妹子利益后拿着银子“义形于色的去了”，黄评：“嫉世之深一至于此。”第四十七回五河县送节孝入祠，余、虞两家一百三、四十个乡绅、秀才，丢下本家节妇不送，趋炎附势去送暴发户方家老太太。小说写道：“那余、虞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，也还厚道，走到祠前，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，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。”黄评：“还说‘诗礼人家’，还说‘厚道’，嫉之甚矣，偏以讥诮语写之，愈见沉痛。”不

仅感知到讥诮，而且体味到这种讥诮是出于“嫉之甚”，出于“沉痛”，有时还能深一步指出：“非玩世也，正是嫉世之深。”这就是对“嘻笑之怒甚于裂眦”的讽刺艺术的体认。

总之，黄评认为，吴敬梓因“嫉世”太深，激而为“骂世”、“玩世”，实则为“醒世”、“救世”。黄小田强调这点，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。《儒林外史》以其尖锐的批评震惊了读者，也受到封建文人的攻击，如后来黄安谨所说“有以为形容刻薄，非忠厚之道”（《〈儒林外史评〉序》）。徐允临也说“或视为漫骂之书而置而弗顾”（《从好斋辑校本·跋》），黄小田起而反驳说：“……本系《儒林外史》中人直无从索解。而解者又曰‘先生之笔固妙，未免近刻。’——夫不刻不足以见嫉世之深！”（卷首回目后题识），刻薄讽刺正是因为嫉世情深、救世心切，不理解这点，或者是因为他“本系《儒林外史》中人”，或者是因为“不善读”，“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，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。”黄小田这一论析的影响，不仅在天目山樵的题识和黄安谨、徐允临的序跋中可以见到，在金和的《儒林外史·跋》、邱炜菱的《续小说闲评》、天繆生的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》中都可以见到，天繆生说《儒林外史》等书，“以刻毒之笔出之”，是因为“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，血透纸背而成者也。”后来鲁迅也称扬吴敬梓“秉持公心，指摘时弊”，“托稗说以寄慨”。如果我们但取小说中的滑稽讽刺皮相地谈其“艺术”，岂不还停留在被黄小田所訾议的“不善读者”？

正因为吴敬梓的激情是经过凝冻的，因此笔锋犀利而却冷峻，常常采用淡淡写出的笔法，不是剑拔弩张，声色俱厉，而是蕴藉含蓄，婉而多讽，比近代《官场现形记》等小说之“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”（鲁迅语）高出一筹。《儒林外史》的这一风格，黄小田也多次指出，并认为这是许多人不能理解其深意的一个原因：“以前数十回淡淡着笔，无人能解”（第三十八回）；“世人往往不解者，则以

纯用白描，其品第人物之意，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”（题识）。这里，黄小田把“淡淡着笔”同白描手法联系起来，可谓有识之见。白描，按照卧评的理解是：“直书其事，不加断语，其是非自见”，作者只是不动声色地直接精确描摹人物的言行，“其品第人物之意”，既不由作者加重渲染或烘托出来，更不由叙述者“加断语”评说出来，只是“令人于淡处求得之”，收到“是非立见”的白描效果。卧评第四回举对严贡生的描写为例：“才说‘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’，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，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。使拙笔为之必且曰：看官听说，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，文字便索然无味矣。”黄评赞赏曰：“妙批。一部书多用此诀。”

这里，实际上已涉及叙述观点的发展。在说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，常由说书人——叙述者直接出面指点、评论、介绍，所谓“看官听说”如何如何，便属此例。吴敬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说书人的评述模式，而发展为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叙述方式，力求缩短人物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，不使叙述人横亘在它们中间，因此尽量不是由说书人——叙述者向听众介绍故事，而是由小说人物自己显现在读者面前。人物的出现和退去的转递，不再象话本那样由叙述者出来“按下”一边，“另表”一边，而是小说情节自然发展的结果。第三十八回郭孝子的故事告一段落，转递到老和尚、萧云仙，黄评：“顺手复递到老和尚，其实是借老和尚递到萧云仙，却又不用‘按下慢表’，‘且说老和尚’云云俗套。故笔墨雅饬，大异寻常小说，俗目何尝得知。”对于由叙述方法的发展而带来的小说艺术的发展，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
从这种认识出发，黄评对小说中众多人物如何出场，如何转递，前后如何勾联、呼应，出现人物姓名的方法如何变化等等，作了较细致的观察。黄评和卧评一样认为泰伯祠大祭是全书结构的中心，它对各类人物如何一批批聚拢，然后如何汇聚到大祭中来，有一些独到的发现。

《儒林外史》以儒林为中心，描绘出社会生活的风俗画。黄小田对安徽、江浙一带的民情风俗、方言土语十分稔熟，他的评点常能道出这轴风俗画的细腻真切之处。

芜湖一带是他的家乡，对芜湖风俗的描写他最感亲切，第二十一回写牛老儿、卜老爹的淳朴生活和牛浦郎结婚的礼俗，黄评连连赞叹：“是芜湖风味”，“是芜湖风俗”。由于他的评点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民俗画面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品味：婚礼这天，一早牛老儿腾出房间的后半间给牛浦郎做新房，“又匀出一张小桌子，端了进来，放在后檐下有天窗的所在，好趁着亮放镜子梳头。”因为是新房，所以需要有给新娘“放镜子梳头”的地方，因为是房间的后半间，所以要“在后檐下有天窗的所在”才有亮光。接着，新娘的兄弟“端了一个箱子，内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针线鞋面，又一个大捧盘，十杯高果子茶，送了过来，以为明早拜堂之用。”高果子茶是芜湖一带婚礼中的一种陈设，在杯中满贮各色蜜饯或白糖，上插小纸花。“到晚上，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蜡烛点在房里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，央请了邻居家两位奶奶把新娘子搀了过来，在房里拜了花烛。”把小百姓的婚俗写得如此细腻真切，连蜡烛上插的通草花都写出来了，黄评一再赞曰：“细甚”，“细极”。从这一斑可以窥见吴敬梓风俗画的逼真风格。此外，第二十三回石老鼠谎称是牛浦郎的“长房舅舅”，黄评：“芜湖人最怕母舅，而长房舅舅尤重，故以此吓牛浦。”第二十四回黄评：“‘帮一个衬’是芜湖语。”第二十一回在“郭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”处黄评：“吉祥寺山门下开小铺面，大半用柜台自圈在内，防人走入窃物，故曰‘爬出来’，非错字也。”如果没有黄评，我们当真要以为印错字了呢！按小说所写，吉祥寺在“浮桥口”附近，这一带至今仍称“老浮桥”，当年是长江和青弋江的交汇处，是农产、山货的集散地，大小商贩熙来攘往，十分杂乱，故有黄评所说的小铺面用柜台自圈在内，防人走入窃物的情况。黄评帮助我们了解，从风俗、土语到地理环境、

人物动作，吴敬梓都不是率尔操觚随便下笔的，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真是精细入微，而且对形象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力和捕捉力。

黄小田谙熟安徽和江浙一带的民情习俗，因此也能感知吴敬梓所写各地民情习俗之歧异。徽州山区比较闭塞，风气不开通，与苏州等江浙大城市殊异。第四十八回余大先生来当徽州府学训导，一上任，秀才们都来拜会，黄评：“是徽州，他处人不然，老师到任并无人知。”王玉辉撰写礼书，将三礼分起类来教子弟习学，黄评：“迂而无当，是徽州人著述。”王玉辉看到苏州妇女穿鲜艳衣服坐游船，认为“这苏州风俗不好”，黄评：“盖徽州人至苏州，便无一事看得上眼。”王玉辉到邓尉拜奠亡友后“含泪上船”，黄评：“此则徽州人诚实处，不在迂呆之列。”点出了徽州人的地域心理素质特点。它不但与苏州不同，而且与嘉兴也不同，第七回小说写蘧景玉讲四川学差不知苏轼为何人的笑话，黄评：“谈笑蕴藉，是嘉兴朋友。”第八回写娄公子坐船从嘉兴回湖州，一路水乡景物，黄评：“是嘉湖风景”。不同地域的人心理素质的差异主要由社会环境造成，但自然环境也是孕育的因素，嘉湖一带的自然环境与蘧佑、蘧景玉父子的风流蕴藉是相得益彰的。

黄评对人物描写、语言艺术、结构安排等许多方面都不乏有识之见，但也有不少平庸落后的意识和地主阶级文人的偏见，此不一一论列，好在全评俱在，读者自可通过分析鉴别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

李汉秋

一九八六年春于吴关斋新居

儒林外史序

古今稗官野史，不下数百千种，而《三国志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及《金瓶梅演义》，世称四大奇书，人人乐得而观之，余窃有疑焉。

稗官为史之支流，善读稗官者，可进于史，故其为书，亦必善善恶恶，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，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。《西游》元(玄)虚荒渺，论者谓为谈道之书，所云“意马心猿”，“金公木母”，大抵“心即是佛”之旨，予弗敢知。《三国》不尽合正史，而就中魏晋代禅，依样葫芦，天道循环，可为篡弑者鉴；其他蜀与吴所以兴废存亡之故，亦具可发人深省，予何敢厚非？至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海盗海淫，久干例禁，乃言者津津夸其章法之奇，用笔之妙，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，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，皆各穷神尽相，画工化工，合为一手，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。呜呼！其未见《儒林外史》一书乎？

夫曰《外史》，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；曰“儒林”，迥异元(玄)虚荒渺之谈也。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：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；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；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，被人看破耻笑者；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，品地最上一层，为中流砥柱。篇中所载之人，不可枚举，而其人之性情心术，一一活现纸上，读之者，无论是何人品，无不可取以自镜。

《传》云：“善者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惩戒人之逸志。”是书有焉。甚矣，有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之笔之才，而非若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之致为风俗人心之害也，则与其读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宁无读《儒林外史》。世有善读稗官者，当不河汉予言也夫！

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序。